

同死神決戰的勁旅

44.652
C695

906369

同死神决战的劲旅

张天来 著

中国人事出版社

S22.44
7000

(京)新登字 099 号

同死神决战的劲旅

张天来 著

*

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建照排厂激光照排

北京市包头营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25 印张 330 千字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80076-253-X/1·008

定价:7.00 元

献给敬爱的读者

搞新闻工作几十年，在报告文学领域内成绩甚小。前几年出版过一本《黄河的儿子》，收集了一部分通讯和报告文学；这一本《同死神决战的劲旅》，大部分是新写的，也有一两篇是前面那本未能容纳的。

几十年中我采访写作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我接触的只是中国广大知识界的一个小小的部分。我很爱我写的这些人物。我知道我并没有写好，但我是怀着一种极大的敬意来写的。他们之中许多人的事迹，让我流了许多泪。我没有写一句假话，我认为编造一些情节是完全不必要的。报告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二字。诚实的记者、作家只要在深入采访当中付出足够的劳动，他们本来是可以不必用主观想象来代替客观实际的。

我敢于把这本不象样的集子献给读者，是由于我完全相信，我写的这些人物对广大读者来说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特别是青年读者，可以从这些知识分子身上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精神食粮，找到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

作者

1992年元月

作者简介

张天来,1932年生,天津市蓟县人。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在新闻岗位从事编、采工作40余年。历任光明日报记者、特派记者、总编室副主任、政治经济生活部主任。并曾兼任中国人才报总编辑。由于他在新闻事业方面的突出贡献,自1991年7月起,领取政府特殊津贴。

本书是他的第二部报告文学集。他还出版过自然保护区方面的十多种书籍,其中《自然保护区奇趣录》数次获奖。在《光明日报》的30余年中,他用大半时间从事教育方面的宣传报道,在多种刊物上发表报告文学、通讯和传记。他参加并组织了一些重要的、连续的典型报道,其中有的文章已被选为教材或被编辑成书出版。

目 录

献给敬爱的读者

精神财富篇 (1)

同死神决战的劲旅

——与友人书 (3)

华山抢险记 (26)

姜泗长风格 (38)

高大的排头兵

——记四位所长 (53)

艰苦奋斗篇 (81)

大漠风流

——来自治沙科研第一线的报告 (83)

(一)他们是红柳,还是梭梭? (85)

(二)黑河北岸的新绿洲 (98)

(三)酒泉——敦煌所见 (104)

(四)中国沙漠学的开拓者们 (112)

(五)世界沙都纪事 (118)

(六)榆林大喜讯 (130)

(七)一对治沙老夫妻 (139)

(八)绿了章古台、白了少年头 (147)

丁老头

——一位老专家、新党员的故事	(154)
我的家,在敦煌	
——记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	(172)
直插天际的云杉	
——记黎克强总工程师	(197)
磨穿铁砚艺方高	
记书法家杨向阳	(226)
国宝放光篇	(233)
复活国宝的大师	
——记高级工程师叶宏明	(235)
他摘下了“水果之王”的桂冠	
——记高级工程师朱鸿云	(245)
企业家和发明家篇	(259)
开凿地球的大师	
——记陈日新	(261)
工程师+企业家=战略家	
——上海先锋电机厂厂长郑宝伦纪事	(275)
并非虚构的传奇故事	
——记发明家李华松	(289)
珍珠大王	
——访人大代表、农民企业家沈志荣	(301)
实践篇	(305)
来自河北农村的报告	(307)
系列报告:吉林企业的承包制	(324)
首钢:两次座谈会的原始记录	(352)
珠江三角洲启示录	(360)
致谢	(388)

精神财富篇

同死神决战的劲旅

——与友人书

(一)

朋友,我亲爱的朋友!在我们伟大的共和国诞生40周年的春天,我接受了一项庄严的采访和写作任务:给一大群军事医学研究者写一篇报告文学,让这些同死神决战的人们的功绩永远载入史册。

真的,这是我40年写作生涯中从未有过的一次采访活动。我写过许多位医生(包括一些军医),但从未写过同原子战、化学战、生物战作殊死搏斗的军事医学研究者。这个领域,曾经是报道的禁区,在这条战线上创造着不朽业绩的人们曾经决心,并且十分愿意做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

我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那些记载着感人事迹的书面材料,温习着刚刚结束的采访活动所记下的厚厚的一本笔记,我实在无法抑制我对英雄群体的无比崇高的敬意。猛然间,我仿佛看到:在祖国广阔无垠的大地上,有一支无敌的威武雄壮的劲旅在前进;我又仿佛看到:在一座高不可攀的医学巅峰上,站立着几千名白衣英雄。

如今,当我提起笔来开始写作的时候,朋友,我实在无法抑制我的激动,无法抑制我对这战败了死神的英雄群体的无比崇高的敬意。几天之内,我不知道从哪里下笔好。我走在北京的街头,我坐在车上,我伏在写字台前,甚至躺在床上,这些无名英雄的高大形象都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们的谈话在我耳边震响。

是的，那只在透明罩内保存着的特制的奖杯，镶嵌着一面金色的国旗，记载着他们所得的国家级特等奖项目——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从1985年起，它被军事医学科学院一位科学家从人民大会堂抱回院内，现在被放在陈列室最显要的位置，让人看了感到肃然起敬。

这只大奖杯，记录着我国人民同死神手中的特种武器作斗争的伟大胜利。

翻开近几十年的战争史，我们仅举几例，就会看到那些帝国主义侵略者，阴谋决策者和发战争财的人们，制造的骇人听闻的事件至今还令人发指：

1936年，在中国的东北，日军细菌部队灭绝人性地在中国人身上做细菌武器试验，至少夺去3000个中国公民的生命。

40年代，在浙江、江西、湖南、四川等省，日本侵略者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疾病流行，人们成千上万地死去，难以计数。

1945年，美国把两颗原子弹同时投在了日本的长崎、广岛，20多万军民伤亡，未亡者受到辐射伤害，遗留下无法治愈的病症，甚至威胁到子孙后代。

80年代初，人们在阿富汗、柬埔寨、老挝边界，发现了有人在使用致命的真菌素。而在老挝中部高原，出现过黄色粉末“雨”。

中国人同这些灭绝人性的特种武器——战争死神展开肉搏战，从50年代初开始。那时候，美国侵略军在中朝接壤地区使用了细菌武器。当时，美国在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搞了20年，苏联也搞了10年。

“但是我们现在的水平同他们靠拢了、接近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代表1985年7月在人民大会堂郑重宣布，“而且有的项目并不比他们差。”

同美、苏的水平接近，意味着什么？人们对我说，我们在战时特种武器的医学防护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表明，这些特种武器造成的伤害，我们可以防治，它们对中国不再构成威胁。历史真的充满各种戏剧性场面：几十年前在中国大地上施用过灭绝人性的特种

武器的国家,曾是我们的敌人,而今成了我们的友好国家;当他们的军事代表团和医学家代表团在中国看到我们的成果时,他们以科学的态度承认:中国,的确站在了世界的前列。既然最终还是要友好相处,当初何必以毁灭性武器相见?!

朋友,我想你会问:现在是和平的年代,那些成果还会有这样大的实际价值,值得如此激动吗?

请你把目光回到十几年前,1976年7月,世界地震史上空前的唐山大地震之后,一平方米有几百只苍蝇,一个水缸盖上苍蝇竟有270多只;蚊子更是成倍孳生。整个唐山震区,成了苍蝇、蚊子的巨大繁殖基地,成了“蝇蚊王国”。许多的医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到唐山,一个焦急的悬念让人们寝食不安:瘟疫大流行要到来?能不能扑灭?

正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批科技人员接受命令由山东赶到唐山。他们带着在10年间研制出的一整套“超低容量喷雾器”。大型的车拉,中型的人背,小型的可以挂在飞机翅膀下面。这是战时部队防病灭虫的理想器材,主要是针对细菌战的。他们正在山东10万亩农田上作飞机喷洒灭虫试验,捷报频传,一声令下就把参加试验的全体人员和飞机一起调到唐山来了。

啊,在地面上,手提的,车载的,许多台喷雾器上了战场;在空中,超低空飞行的飞机喷洒着灭虫药物。这种超低容量喷雾器,是朱成璞教授领导的研究组在国内首先研究推出的新技术。喷出的是很细很小的雾滴,比过去一般稀释的药剂水滴要小千倍左右,大大减轻了携带的重量和简化了操作,提高了效率。在96平方公里的灾区,很短的时间内,喷洒了45吨的灭虫药剂,平均每平方公里半吨左右。

一场正在酝酿的大瘟疫被扑灭了。唐山向全世界宣告:大灾之后不一定要有大瘟疫流行。

消毒专家刘育京研究出的一种高效消毒剂,一分钟就可以杀死肝炎病毒。就是他所在的研究所,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出口皮毛全部消毒的国家。

现在,朋友,我请你把日历翻回到 1963 年,把目光集中到安徽省合肥市三里庵。庵本为堰,安徽人把堰读作“安”。那年,三里庵的一户六口人家,竟然完全受到了放射性钴的照射。适量的钴照射可以让人解脱病痛,生活得更美好,过量则会夺去人的生命。多大的误会:这家的一个孩子把一只“钴源”拿回了家,放了几夭,弟兄二人受钴的照射过量——钴射线已进了内脏,到达肠部,还没送到医院已经死去。另外 4 人,孩子的母亲、叔叔、哥哥、妹妹,被送到了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 307 医院。307 不过是一个序列排号,它的实质内容是:这家医院是全军以至全国唯一的放射病医院,唯一的放射病临床研究中心。307 医院由治疗这 1 位患者而开始名闻海内外,这是中国人征服放射病的第一曲凯歌。

是的,我采访了这家医院。邢家骝院长(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现年 55 岁)对我说,到 1988 年止,这里已经收治许多起放射事故的病人,包括 16 位受到较大剂量照射的重度病人。这些病人,被医务人员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

现在正在住院的一名病人叫王富强。他是南京扬子乙烯工地的气焊工。1988 年 12 月 27 日,人们用监测仪在王富强家测到了放射源信号;这只放射源(象一条敲木鱼的小棍,头部是铝皮和不锈钢包裹着的放射源,柄是有弹性的细钢丝)此时已丢失 128 小时,在王家约 48 小时。经过医务人员检查,有 14 人受到伤害,最重的王富强被兼程送到 307 医院。

如今是 1989 年 2 月中旬,王富强的伤已经被治好,不久就要回南京去了。

有一个病例,让国际上的同行感到震惊。那是 1980 年 9 月 1 日上午 9 时,在外地某研究所,一位 25 岁的青年工人,两次误入正在照射状态的钴源室。照射剂量之大,使得这位身强力壮的青年人一出钴源室就面部发烧、头晕、口唇麻木肿胀。半小时后恶心,1 小时后呕吐,到下午 1 时就吐了八次。下午 3 时,一架专机把病人送到 307 医院。诊断结果,确定为重度骨髓型急性放射病。在放射病中,射线进入骨髓是最重的一种。青年病员在 307 医院病床上停留

了50天,接受各种治疗,渡过了许多病员都要经历的初期、假愈期、极期和恢复期。在极期,一般病员要发热、感染和出血,而这位病员身上却一样也没有出现。这种罕见的现象让人感到惊异。

1988年10月,这一病例在美国召开的国际放射事故医学处理讨论会上报告之后,引起了一场轰动。

同年10月,我国专家访问法国、联邦德国,报告了我们在治疗急性放射病方面的成就。那里的同行专家们说,中国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已经比较丰富。而在这中间,中国自己找到了两种国际上没有的药物,疗效甚好。

朋友,我还不能不告诉你,为防治化学武器伤害所取得的成就,应用于和平时期,同样大放光彩。你大约知道有一类叫做氰化物的有机化合物,例如氰化氢,它是一种易挥发的液体,熏蒸消毒,钢铁表面硬化,电镀和选矿等等化学工艺,都要用它;但当它变成气体,而且达到很高浓度的时候,它就产生剧毒,半小时内就可以让人死去。现在,可以说,对氰化物中毒预防和急救的特效药物,我们已经找到。另一类有机化合物——有机磷,对消灭虫害有极大的威力,而它的气体过量的进入人的呼吸道,也会造成神经性中毒。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们所研制的几种解磷针,已救治有机磷中毒者6000余例,无一死亡。

这里,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1971年,由广东传来一份十万火急的求援电报,说是新会县发生农药中毒事件。医务人员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用解磷针救好了一批中毒者。但是,他们发现,有一些患者并不是农药中毒,所患的病也不能打抗毒针,及时纠正了这些误诊。由于有一些人农药中毒,人们说稻田里有毒,田里的鱼都死了,不敢下水,眼看水稻生产要大受影响。医务人员告诉大家,稻田的水里没有毒,有的稻田几天以后也没有毒了;而且抓了些鱼来放到稻田水里让大家看,解除了农民们的顾虑,结果是水稻生产没有受什么大的影响。

是的,朋友,这些激动人心的成就,是由一支无敌的劲旅所取得的。这支劲旅中,有4000多名科技人员,他们属于军队和地方

200多个单位。当然,这支劲旅的主力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技人员。

他们在27年的时间里,完成了124项课题,有95项成果获得了国家发明奖、国家科学大会奖和军队三等奖以上的奖励。

朋友,写到这里,我的眼前又出现了那一座耸入云天的医学高峰,那高峰上迎风飘扬着三面国旗:美国的、苏联的、中国的。我们的旗帜比他们晚了好多年,但我们还是插了上去。

自豪吧,朋友,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成就。我们中国人做出了如此惊天动地的成就来,应该怎样感谢那些无名的英雄?!我想,最好的办法是学习他们的精神,在自己的岗位上更加发愤图强,创造出更大的成绩来。

(二)

朋友,我现在坐在刘雪桐教授的工作室内,听他讲述当年在核试验现场的工作情况。他是我认识的同死神决战的劲旅中的第一位英雄。

在军事医学科学院,他是著名的放射病理学专家。他今年64岁,正好是25年前的1964年,他说过的一句话,叫人们至今不忘,“万事俱备,单等冲锋了。我已经儿女双全,明天我第一个上去,你们……”那正好是我国第一次核试验前夕,他表示要带头进入核试验污染区。

刘雪桐解放前毕业于沈阳盛京医科大学,1952年来到军事医学科学院。1956年开始,他参加核武器致伤的防护研究,分工研究放射病理学。1960年起的几年内,军事医学科学院为参加核试验培训干部,刘雪桐担任了一部分课程的教学工作。

直到1961年,他才被通知说,要试验核武器,准备出差。

“啊,当时的心情,至今不会忘记。那年我39岁,担任试验现场生物效应队副队长。”教授这样回忆和描绘着,“当时,刚刚渡过3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还那么困难,陈毅元帅请我们参加第一次核

试验的人员吃饭,每桌两大盘红烧肉,……那么大的场面,让人升起荣誉感。当时试验现场生活条件不好,我们大家以苦为荣。戈壁滩上树立着一排大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是的,第一团蘑菇云在戈壁滩上升起的一刹那,刘雪桐没有跳起来,热泪含在眼眶里没有流下来,但心潮却在翻滚。

党委会上,他提出要乘第一辆车深入爆心地区观察,取得原子武器杀伤情况的第一手资料。许多同志也争着要去,他把手一挥:“不要争了,我是这儿技术上的负责人,就是只去一个人,也应该是我!”

他要求爆炸后连夜进入爆区,上级没有同意,因为那实在太危险。第2天早晨,进入现场的同志们穿上白色的防护服列队检查装具,然后登车出发。刘雪桐怀中还抱着一个发烟罐,那是万一汽车出故障时发求助信号用的,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在沾染区行留的时间,减少人遭受的辐射。

汽车进入距爆心800米处。刘雪桐和战友们飞快地跳下汽车,分秒必争地拍下实验动物的照片,记下有关资料,并将实验动物装上汽车,然后迅速撤离现场。

清晨,他疲倦而兴奋地脱下防护服,在电话中郑重的向上级报告,从试验动物的情况也能证实,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是成功的。

刘雪桐后来得知,周恩来总理亲自阅读了他写的核试验现场情况的报告。

核试验现场是我军取得感性材料的唯一来源,核爆炸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怎样预防和医治这样的材料,在实验室里是没办法获得的。

朋友,从刘雪桐和他的战友开始,人们在21个年头里,19次进入核试验现场。是的,刘雪桐是我军核试验现场生物效应观察研究的开路人。他走在最前面,一批青年人紧紧跟在后面,前后有一千多人次。

那是什么样的现场啊！几千年前大漠中的楼兰古国的遗址就在它身边，如今还躺着几根不朽的胡杨木。荒漠，方圆几百公里的荒漠。天气象“猴脸”，说变就变，一会晴空万里，闷热得象钻进了蒸笼；一会飞沙弥漫，吹得人睁不开眼。冬天的气温常常在零下20多度，夏天地表的温度可达70度。刚建场时，没有实验室，也没有生活设施，做实验就在临时搭起的棚子里。晚上就住在半地下的窝铺或者帐篷里。床铺不够，有人就干脆睡在冰冷的地上。冬天睡上一夜，早上起来的时候腿脚都没有暖热，茶杯里喝剩下的水结成了冰，洗脸用的毛巾冻成了冰板儿。晚上狂风把帐篷掀倒，还要搭起来再睡。夏天更加难熬。大家都要穿上全身不透气的橡胶防护服，戴上几斤重的防护面具，在能晒死狗的沙滩上坚持训练，几个小时下来，人都象河里捞出来的一样，防护服中都能倒出一碗碗汗水。现场伙食标准不低，可饭菜里总是夹杂着沙粒。喝的水是咸中带苦的湖水，许多同志喝了都拉肚子，有人开玩笑说：这地方真不错，大便的次数比小便多。

可是，白衣战士们把参加现场试验看作是一生最大的光荣。个个迎着困难向前冲。

朋友，我找到了陈德政，他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今年已经60岁。19次试验，他参加了10次。有一次他离家西去的时候，爱人正在住院，患的是肾炎、尿毒症，病情较重。他到医院告别了爱人，在现场工作了半年，由于样样任务完成得好而受到奖励。他服从纪律，没有给爱人写信，回到北京，爱人还没有出院。家中到处是厚厚的尘土，蜘蛛结了一面面网，老鼠抛洒了满地的粮。这些往事，别人都还记得，他自己却不再提起。他同我兴致勃勃地谈着参加试验所经历的往事：

每次试验，只是做试验用的动物就要从北京装几车皮，运到遥远的西部大戈壁，包括兔、狗、猴、鼠、猪，象是动物园搬家。还有各种仪器设备和器材，从包装、运输直到目的地，要万无一失，不能打坏一件。首先要装好，不然在搓板样的公路上一颠就坏。那狗、兔等动物每天要喂两遍。狗拉得满车稀粪，要经常打扫、冲洗狗笼和